

传承不朽的抗战民族精神

——读《石景山区离休老干部抗战记忆》有感

文/刘会生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要时刻,通读了《石景山报》刊发的《石景山区离休老干部抗战记忆》的文章,使我穿越时空,回到了7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通过健在的抗战老兵口述的历史,追寻无数平凡中国人舍生忘死捍卫国家、捍卫民族尊严的往事,更加感受到抗战民族精神的重要,坚定了传承民族精神,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在日寇的铁蹄使神州大地焦土遍地,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区的抗战老兵祝兴业目睹了日军在家乡牟平杀害上百人的惨状后,不顾祖父母的反对,坚持参加了八路军,投入了抗战的洪流。战斗中耳朵被打穿孔,右耳残废;余昌和为了参加抗战,冒雪跟着部队行军3天,被队伍破格批准参军,在舅舅硬拉回家后,又偷偷地跑回部队。在传令中,他跑炸了肺;石

庆珊在抗战中三次负伤,每次伤好后就又回到了战场。

从这些抗战老兵的抗战经历,我感受到了我们的抗战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就要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他们拼死奋起,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举国抗战、共御外侮,以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救亡图存的家国情怀、同仇敌忾的团结士气、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将亿万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他们“冒着敌人炮火前进”,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用自己的铮铮烈骨、大勇大义,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8年抗战,抗日战争的血与火,锻造了中华民族强大坚韧的民族精神。

第二点体会是在抗战民族精神的激励下,他们发挥创新精神,在各自的战场想出了战胜日本鬼子的各种方法。抗战老兵陈胜利所在部队和村民联合,开展地雷战、地道战。

他们与村民一起挖地道。挖出的地道户户相连,村村相通。地道口设在日本鬼子想也想不到的地方:猪圈、磨盘、马棚,都可能是地道口。挖的地道既能作战,还能防御、能排水、能放烟。地雷有石雷,有铁雷。铁雷是在一个打铁厂造出来的。石雷是采山上的石头,里面放上炸药。制造出来的地雷我们大道上埋、小道上埋、布满大街小巷,埋到日本人想不到的地方,炸得来“扫荡”的日本人晕头转向;祝兴业在当时医疗卫生条件异常艰苦和极度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与连队卫生员尝试着自己动手土法制造生产脱脂棉、蒸馏水、氯化钠等最普通的物品,甚至找出许多民间偏方来给伤员治病,比如上山挖草药,用荠菜酒止血,用大蒜治肠炎、痢疾,用生姜、大葱头治感冒,用艾蒿针灸治关节炎等。读着这一个个动人的史实,我感受到一种让我热泪盈眶的精神

力量,这就是抗战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支撑起了这个民族在一次次苦难、一回回屈辱中奋起抗争,永不言败。正如习总书记讲的那样,正是这种精神,激励了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

第三点体会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传承抗战民族精神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集聚正能量。这些抗战老兵许多人在抗战后都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怀揣着梦想,这就是祖国繁荣富强,家庭生活幸福美好。为了这个梦想,他们奋斗了多半辈子,使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七十年光阴荏苒,硝烟散尽,换了人间。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之际,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还需要我们传承起抗日战争中英雄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质,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勤勉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这历史的关键节点上,重温抗战,缅怀先烈,是一次荡气回肠的精神洗礼,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继续奋斗、砥砺前行的现实召唤。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深入人心,正是支撑我们以高度的自信和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能量之源。我想,这应当是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应有之义。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因为修史“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组织我区的作家和摄影师采访健在的参加抗战的离休老干部,并将他们的口述记录整理成文,这本身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好事。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壮举将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梦荷

赵颖摄影



诗·文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佟金力

卢沟桥畔起硝烟,咆哮黄河震九天。地北天南播战鼓,同仇敌忾逐倭顽。前赴后继英魂去,血染山河国土还。珍爱和平铭记史,中华圆梦有何难!

投稿要求

- 副刊征集作品内容:
1. 生活散文、随笔、评论等文字作品,字数1200字左右。
 2. 摄影、书画、漫画等图片作品,请以jpg格式投稿。

副刊投稿邮箱

shuping0926@126.com

蓟城经学的传播

李海荣

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义理,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蓟城聚集了很多研究经学的士大夫,他们为经学的发展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梁祚(402~488年)是北魏北地泥阳(今陕西省耀县)人,幼时居住在赵郡(今河北赵县)。后来,梁祚的姐姐出嫁到了范阳,他家也随之搬迁到了蓟城。梁祚笃志好学,对于经学的著述做过广泛的研究,尤其精通公羊《春秋》和郑氏《易》,在蓟城设馆教学十余年。他清贫守素,不肯结交权贵,颇有儒者之风,以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而为世人称道。

梁祚与蓟城人平恒(411~486年)是好朋友。平恒自幼勤奋刻苦,博学多闻,不仅综研经籍,还撰写过《略注》一书。这本书记述了历代统治阶级的兴衰过程,是一部述史兼以鉴世的著作,在当时颇受推崇。后来,朝廷征召平恒为中书博士,又派为幽州别驾、著作佐郎、秘书丞。和梁祚一样,平恒也是一位安贫乐道的学者。他廉贞寡欲,即使家中无米下炊了,也不肯改变操守。平恒的人品和学问在北方学者中声誉极高,连为太子讲授经学的名士高允都赞叹称“博通经籍无过恒也”。

而当时幽州还有一位与高允齐名、并称“二高”的高闾(?~502年),也是博通经学的大家。高闾是渔阳雍奴(今天津武清)人,出身官宦世家。他文采富丽,下笔成章,被北魏太武帝拜为中书博士。献文帝时,他以《鹿苑颂》、《北伐碑》等文章深受皇帝嘉奖。孝文帝承明初年(476年),高允推荐高闾代替自己的官职。于是,朝廷很多诏令、书檄、碑铭、颂赞之文都出自高闾的手笔。后来,他多次请求在故里州郡任职,孝文帝任命他为平北将军、幽州刺史。不久又被调回中央修订雅乐与律法。

随着民族不断的融合,少数民族中也不乏经学研究的学者。密云丁零人鲜于灵馥就是其中的代表。当时,私人讲学传经是一种主要的教育形式。鲜于灵馥汲取汉族文化,也开始聚徒讲学。但是他比较自负,贬低范阳的同行徐遵明(475~529年)为“羌博士”。一次,鲜于灵馥讲解《左传》,曾经追随徐遵明学习的李业兴向他请教数条大义。结果,鲜于灵馥都被问住了。于是,李业兴拂袖而去,重返徐遵明门下。很多同学也随之到徐门求学,从此徐门学徒大盛,声名远播。徐遵明也成为当时北方经学的大儒,对燕、蓟地区的学术传承和教育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